

雍正皇帝遣使赴俄外交禮儀交涉 ——兼論清朝官書不載托時、德新使俄問題

陳維新 *

摘 要

雍正七年(1729 年)，清朝政府行文給俄國，表示將派使臣前往莫斯科向新登基的彼得二世祝賀。並有隨同使臣前往的朝廷官員，將向俄國借道前往土爾扈特部族居住地。同年五月十八日，清朝政府為派使臣前往俄國賀俄皇即位，及派官員前往土爾扈特一事再發出咨文，表示將派侍郎托時等人前往俄國，此封咨文並由托時攜帶前往俄國。

雍正為何要派使節團前往俄國，是單純的只為慶賀俄皇登基，或是另有其目的，其背後動機值得探討。而中國第一次派正式的使節團前往俄國，在清代官修史書上，卻看不到任何的記載。對於此段史實，部份學者曾撰文探討，但說法不一，另外可能受限於當時環境因素，部份滿文、俄文檔案史料因而未引用在文章之內。本文擬引用相關檔案史料，針對雍正為何要派使節團赴俄國的動機，並用「封貢體制」之概念，說明托時等人與俄國政府人員交涉有關觀見俄國皇帝外交禮儀問題，以及為何清朝官修史書不見此段記載，而部份學者對此文題所提出不同的看法，筆者擬作簡單扼要的說明。

關鍵詞：封貢體制、土爾扈特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壹、前言

雍正七年(1729 年)，清朝政府理藩院行文給俄國樞密院，表示將派使臣前往莫斯科向新登基的彼得二世(Peter II，1727-1730)祝賀。並有隨同使臣前往的朝廷官員，將向俄國借道前往土爾扈特(Turugut)部族居住地(伏爾加河，Volga R.流域一帶)。同年五月十八日，理藩院為朝廷將派使臣前往俄國賀俄皇即位，及派官員前往土爾扈特一事再發出咨文，表示將派侍郎托時等人前往俄國，此封咨文並由托時攜帶前往俄國。

依照「封貢體制」規定，凡大清國之「屬國」在王位替換之際，新國王即位之時，屬國均會派遣使臣前往北京向朝廷報告，再由朝廷派遣專使攜帶大清皇帝的「敕書」、禮物等，前往該國向新國王宣讀大清皇帝的詔書，「冊封」該國新國王，並賜予禮物。但此次清朝政府卻決定「破例」，使臣不再攜帶雍正的「敕諭」給予俄國，亦即不將俄國視為大清國之「屬國」，而給予平等的對待。清朝政府如此作法，是當時大清帝國在對外關係上，是相當特殊的例子。

雍正為何要派使節團前往俄國，是單純的只為慶賀俄皇登基，或是另有其目的，其背後動機值得探討。而中國第一次派正式的使節團前往俄國，在清代官修史書上，卻看不到任何的記載。對於此段史實，部份學者曾撰文探討，但說法不一，另外可能受限於當時環境因素，部份滿文、俄文檔案史料因而未引用在文章之內。本文擬引用相關檔案史料，針對雍正為何要派使節團赴俄國的動機，並用「封貢體制」之概念，說明托時等人與俄國政府人員交涉有關覲見俄國皇帝外交禮儀問題，以及為何清朝官修史書不見此段記載，而部份學者對此文題所提出不同的看法，筆者擬作簡單扼要的說明。

貳、「封貢體制概」念簡述

依照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國是居於世界的中央，視周圍四方的外族人為「蠻夷」，「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這種思想與觀念影響歷代的皇帝與其臣民。甚至到了清朝，此種「天朝上國」居於世界中心的觀念意識，依然是根深蒂固。

清朝政府是以自我為中心，按照遠近親疏、地理位置等，制定一套確認周邊屬國藩部與外國在大清帝國體系的等級與其名分、尊卑地位的體制。在此體制中，大清帝國的皇帝是處於至尊的帝位，而一切外國則都成了大清帝國的「屬國」，不僅是周邊的小國，即便是單純為通商的國家，派遣使臣前來商議貿易問題，也被清朝政府認為是「純心向化」，專為「朝貢」而來。中國皇帝既為天下之共主，統馭萬國，因此須負起「頒中華正朔，宣敷文教，俾天下生靈，旁達於無外」¹以及撫治華夷，一視同仁，各保境土，協和萬邦的責任。而此種傳統的文化觀念也是「封貢體制」概念的中心思想。

自清朝進關入主中原後，在對外關係的處理上，基本上是承襲中國歷代各朝的各種禮儀制度，而清朝政府也參酌這些禮儀制度加以因革損益，創建了一套繁瑣對外關係儀禮定制。基本上，大清帝國與周邊屬國藩部間的關係上，約有下列的規定，屬國與藩部必須遵循這些規定。

一、冊封

(一)、 清朝檔案史料記載冊封規定：

¹ [清]萬斯同編，《明史稿》，〈鄭和傳〉，原稿現藏於南京圖書館古籍部。

學者張啓雄在論述「封貢體制」時提到：「中國既與周邊諸王國聯合構成「中華帝國」，並與周邊諸王國個別締結宗藩關係，為突顯其宗藩間的君臣上下關係，於是創出獨特的階層性的封貢體制，用以規範「中華帝國」的宗藩關係。² 大清帝國的周邊諸國須向大清皇帝朝貢，清朝皇帝對於來朝貢的屬藩，不論其為部落或是邦國，均認為其具有「邦國」的身份，並冊封該邦國首長為國王。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禮志 — 賓禮一之藩國禮》一開頭即說：

國家定鼎以來，德威遠著，聲教所暨，莫不來庭，凡蒙古部落率先歸附者，悉歸版籍，視猶一體，及後者彌眾，皆傾國舉部，樂輸厥誠，既地廣人繁矣。乃令各守其地，設理藩院以統之，朝歲時奉職貢焉。

3

該禮志中的「藩國禮」記載清朝政府冊封外藩部落的儀禮規定，清朝政府要冊封有功的外藩部落首領為親王、郡王時，清朝政府會「遣大臣執信約往封，行至本部落邊界，驗視信約，將奉差大臣職名，並冊封各事宜」飛報該部首領，該首領「迎至五里外下馬跪路右，候制冊過，乘馬隨行。」使臣隨首領到該首領府中後，須設香案，使臣捧制冊奉香案上，該首領即行三跪九叩禮後，宣讀官宣讀制冊所載內容，該首領再行三跪九叩禮後，首領與使臣對行二跪六叩頭禮，完成冊封儀式。⁴

² 張啓雄著，《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5年），頁16-17。

³ 《禮志 — 賓禮一》，文獻編號 6000218，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⁴ 《禮志 — 賓禮一》，文獻編號 6000218，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該禮志之「諸國朝貢禮」亦記錄清朝政府冊封琉球、安南國王等事蹟。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大清國修正賓禮志》之敕封藩服禮中，記載冊封儀禮規定：

崇德間定制，凡外邦效順，俱頒冊錫爵，進奏書牘，署大清紀年。若朝貢諸國無子嗣位，則遣陪臣請朝命，禮部奏遣正副使各一人，持節往封，特賜一品麒麟服，以重其行。行日，工部給旗仗，兵部給乘傳，封使詣禮部，儀制司官一人奉節，一人奉詔敕，授本部長官，以授正副使，跪受，興，出，易征衣，乘傳往，將入境，其國邊吏，備館傳夫馬，緣塗(沿途)所經，有司跪接，及國嗣封王遣陪臣郊迎，三跪九叩，勞使者一跪三叩，延入館。陳詔節龍廷內，行禮如儀，謁使者三叩，不答。諏日，王率陪臣詣館，禮畢，王先歸，龍廷昇行，仗樂前導，封使後隨，入門，陳正中，使者及階，下馬正使奉節，副使奉詔敕，入殿，陳案上，退立東旁，王率眾官北面立，三跪九叩，興，詣封位前跪，副使奉詔書，付宣讀官，宣訖，王行禮，如初，出埃門外，使者出，跪送有間，適館勞之，使者還朝，迺修表文，具方物，遣陪臣詣關謝恩。

如諭祭兼冊封，先於其祖廟將事，諭祭文陳案上，使者左右立，世子跪叩如前，退立神位左，迺宣讀，眾俛伏。宣畢，興，送燎行禮，使者跪，退。次行冊封禮，儀與前同，至以詔教授使齋還，則禮部設案午門，位正中，尚書立案左，儀制司官從，館卿率來使入，

授詔敕，序班引詣案前跪，授受如制，退，詣丹墀西，三跪九叩，禮成，歸授國王，謝恩同。⁵

敕封藩服禮是清朝政府對屬國敕封的禮儀定制，凡屬國新王即位，及立世子等，由該國先向清朝政府上奏，經禮部議定後，再由清朝皇帝選派正、副使持節往封。冊封儀式最主要的是，使臣將清朝皇帝的詔敕置放於殿內案上時，屬國新王須率陪臣行三跪九叩禮，詔敕宣讀完畢後，再行三跪九叩禮，以此大禮向清朝皇帝表示謝恩。由上述可知大清帝國的冊封儀禮程序，是一套程序完備儀禮定制。

二、 朝貢

(一)、 清朝檔案史料記載朝貢規定：

〈禮志 — 賓禮一之諸國朝貢禮〉記載：

蒙古部落設理藩院以統之，其餘禮部主客清吏司掌朝鮮、琉球、安南、荷蘭、西洋、暹羅諸番朝貢接待給賜之事。崇德年間定，凡歸順外國俱頒誥冊、授封爵、進奏文移，俱書大清國年號。凡遇聖節、元旦、冬至，具表朝賀，進貢方物。順治元年，定外國朝貢，以表文方物為憑。該督撫查照的實，方准具題入貢，貢使到京，所貢方物，會同館呈報禮

⁵ 金兆豐編或寫，《大清國修正賓禮志》，文獻編號 600013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禮十賓禮〉，《清史稿》第 5 冊，卷 91，志 16（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

部，……貢物交進內務府，……貢船不得超過三隻，每船不得超過百人，入京員役不過二十人。⁶

聖節、元旦、冬至是大清帝國的三大節日，大清帝國屬國藩部派遣使臣攜帶表文及貢物前往北京朝貢，表文須書寫大清帝國年號，亦即是「奉正朔」。清朝政府對於朝貢國貢船、人數及進京人員數量有明確的規定，亦即是對朝貢的規模作了限制。

〈大清國修正賓禮志 — 山海諸國朝貢禮〉記載：

凡諸國以時修貢，遣陪臣來朝，延納燕賜，典之禮部，將入境，所在長吏給郵符，遴文武官數人伴送，有司供館餼，遣兵護之，按途更代，以達京畿。既至，延入賓館，以時稽其人眾，均其飲食。

翼日，具表文方物，暨從官各服其服，詣部埃階下，儀制司官，設表案堂中，質明，會同四譯館卿，率貢使至，禮部侍郎一人出，立案左，儀制司官二人分立左右楹，館卿先升，立左楹西，通事序班各二人，引貢使等升階，跪，正使舉表，館卿祇受，以授侍郎，陳案上，復位。使臣等行三跪九叩禮，興，退。館卿率之出。

禮部官送表內閣埃命，貢物納所司，如值大朝、常朝，序班引貢使等列西班末，聽贊行禮如儀。非朝期則禮部先奏，若召見，館卿豫戒習儀。屆日，帝

⁶ 《禮志 — 賓禮一》，文獻編號 6000218，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殿，禮部尚書引貢使入，通事隨行，至丹墀西行禮，畢，升自西階，通事復從之，及殿門外，跪，帝慰問，尚書承傳，通事轉諭，貢使對辭，通事譯言，尚書代奏，畢，退。如示優異，則丹墀行禮畢，即引入殿右門，立右翼大臣末，通事立少後，賜茶賜坐，均隨大臣跪叩，飲畢，慰問，傳達如初。出朝所，賜尚方飲食，迺退，翼日，赴午門外謝恩，禮部疏請頒賜國王，並燕賚貢使。

既得旨，所司陳賜物午門道左，館卿率貢使等東面立，侍郎西面立，有司咸序，貢使請詣西墀，三跪九叩，主客司官頒賜物，授貢使，貢使跪受，以次頒賜貢使，暨從官從人咸跪受，贊興叩如儀，退，賜宴禮部。

貢使將歸國，光祿寺備牲酒果蔬，侍郎就賓館筵燕，伴送供侍如前，所經省會皆饗之。司道一人主其事，館餼日給概從周渥焉。⁷

上述山海諸國朝貢禮，主要是規定進表、朝覲、頒賞等禮儀定制。從繁文縟節的朝貢禮儀可知，朝貢禮儀是確立大清帝國與藩屬間政治上的臣屬關係，為臣子的藩屬，若不按君臣之義行事，不遵朝貢禮儀，則是大逆不道，藐視皇權，對大清帝國為宗主國地位的挑戰。

⁷ (清)金兆豐編或寫，《大清國修正賓禮志》，文獻編號 600013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參、清朝政府派使臣赴俄國原因

康熙皇帝逝世後，雍正皇帝於西元 1723 年即位，雍正三年(1725 年)時，俄國凱薩琳 (Catherine I, 1725-1727) 登基後，即以祝賀雍正皇帝為由，告知清朝政府她已繼任該國皇位，並派遣薩瓦(Sava Valadislavich)為全權大臣前來祝賀及商議邊界、逃人等問題。

雍正皇帝對俄國派薩瓦來北京一事，展現了極大的誠意，命朝廷官員熱烈接待薩瓦使團，其所受的禮遇，超過以前俄國來華使臣。兩國也簽訂了「恰克圖條約」。俄國也承諾不收納蒙古逃人，對準噶爾部(Dgoungar)動亂一事，保持中立的態度。使得清朝政府能夠全力對付準噶爾部，北部蒙古地區的局勢也能夠掌控，接下來就是與居住於俄國境內的土爾扈特部取得聯繫，加強與該部族的關係，避免該部與準噶爾部聯合，能讓清朝政府無後顧之憂，及早解決準噶爾部在西北部動亂問題，所以藉派使臣前往俄國報聘之便，亦派使團前往土爾扈特部與該部首領會面。

俄國學者班蒂什-卡緬斯基(Bantish-Kamensky) 所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中也提到俄國官員探聽得知，清朝政府是為要「徹底摧毀自己主要的敵人琿台吉(此琿台吉即當時準噶爾部噶爾丹策零，Galdan Tscheren)，他不僅派三十萬大軍同噶爾丹策零進行三年戰爭，而且還派遣使臣請求俄國皇帝，派軍隊予以幫助。而如果他一琿台吉企圖逃往俄國，那就請俄國逮捕他，並把他交出，送往北京」。⁸卡緬斯基還說雍正皇帝似乎很傲慢，因他把準噶爾部的首領看成是無實力的小領主，而清

⁸ [俄] Bantish-Kamensky 班蒂什-卡緬斯基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195。

朝政府請俄國協助中國剿亂，是雍正皇帝派出使團赴俄國的主要原因，至於向俄國新皇帝致敬慶賀登基，只是讓清朝政府派出使團，在名義上有個堂皇正當的理由而已。

肆、托時、德新等人奉派赴俄國

雍正七年(1729 年)五月初六，理藩院行文予俄國樞密院，表示將派使臣前往莫斯科向新登基的彼得二世祝賀。並有隨同使臣前往的朝廷官員，向俄國借道前往土爾扈特部族居住地。同年五月十八日，理藩院為朝廷將派使臣前往俄國賀俄皇即位，及派官員前往土爾扈特一事再發出咨文，表示將派侍郎托時等人前往俄國，咨文上並說：

按我中國之例，凡派使外國均降敕諭，因我國與俄羅斯國原為鄰國，今不再降旨而僅派使臣前往，…土爾扈特本是恭順之部，與爾國亦甚友好，我大聖主格外施恩，特遣大臣前往存問，並降旨令伊等與派往爾國之使臣一同前往。

9

此封咨文並由托時攜帶前往俄國。依照「封貢體制」規定，凡大清國之「屬國」在王位替換之際，新國王即位之時，屬國均會派遣使臣前往北京向朝廷報告，再由朝廷派遣專使攜帶大清皇帝的「敕書」、禮物等，前往該國向新國王宣讀大清皇帝的詔書，「冊封」該國新國王，並賜予禮物。但此次清朝政府卻決定「破例」，使臣不再攜帶雍正的「敕諭」給予俄國，亦即不將

⁹ 〈理藩院為派使臣赴俄及土爾扈特一事致俄國樞密院咨文〉，《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頁 527-528

俄國視為大清國之「屬國」，而給予平等的對待。清朝政府如此作法，是當時大清帝國在對外關係上，是相當特殊的例子。

俄國政府收到理藩院的咨文，對清朝政府要派遣使臣前往俄國祝賀一事表示歡迎，該國並安排一位大員赴邊界城市色楞格斯克(Selenginsk)，準備迎接清朝政府使團，並表示中國使團沿途所需物品，俄方將充分供應，用心照顧，使團返回時，亦比照辦理。而清朝政府所派使團即以侍郎托時、原副都統廣西、原護軍參領宰三為首，以及奉派赴土爾扈特部的副都統滿泰、布達西、阿海斯等人，共計約八十四人前往俄國。¹⁰

當托時等人率使團由北京出發尚未抵恰克圖時，剛登基不久的俄皇彼得二世，突發病去世。此訊息俄國政府遲至雍正八年七月(1730年8月)才發文通知清朝政府，那時彼得二世已去世半年多，而清朝政府接到俄國的咨文已是同年年底了。托時使團已由恰克圖進入俄境，在該國官員的陪同下，取道色楞格斯克前往莫斯科，但該國官員並未向托時說明彼得二世已經逝世，但托時從俄國護送使團的差役得知此消息。托時私下向俄國官員說，若俄國政府公開向使團宣布該國君主去世訊息，那麼使團必須暫停下來並向雍正皇帝稟報此事，並靜候朝廷諭旨，如此須拖延甚久時間，若在抵達或臨近莫斯科時再向使團宣布，則使團仍然可以繼續前往。¹¹雙方官員對此事達成默契之下，托時使團仍續行前往。

¹⁰ 出團人數確實數目清朝檔案與俄國檔案記載有異，清朝檔案記載該團共計有 84 人，參閱《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頁 531，俄國檔案則記載為 58 人，參閱《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該兩種檔案記載人數上的差異，可能是使團人員部份是喀爾喀蒙古台吉，他們護送使團至邊境後，未隨使團進入俄國境內，所以俄國檔案未將該等人列入所致。

¹¹ 《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頁 199

彼得二世過世後，由安妮·伊凡諾夫娜(Anne Ivanovna，1730-1740)接任皇位，俄國政府即派官員遞送公文至北京，公文內容提到該國君主即位後，立即發布諭令表示，俄國既與中國和好，樞密院即應將她登基一事告知中國政府，並應向中國政府表示，她不會違背先前與中國所訂友好條約，她相信中國皇帝也必能遵循兩國所訂友好條約。¹²雍正九年二月，理藩院奉雍正皇帝諭旨，發出咨文予俄國樞密院，內容稱對俄國來文表示該國新女皇繼位一事，雍正皇帝降旨稱，「俄羅斯國與我接壤，多年友好往來，今女皇念及和好之道，特派使前來奏聞繼承汗位之事，對此，朕甚嘉許，…可派使攜帶禮物前往慶賀」。¹³清朝政府決定派內閣學士德新、侍讀學士巴延泰為特使，率團前往俄國。另外清朝政府也安排由內閣學士班第等人前往土爾扈特部。¹⁴

伍、托時、德新兩使團覲見俄國女皇

托時使團在俄官員的陪同下，於雍正九年 (1731 年 1 月) 抵達莫斯科，受到俄國政府以隆重的儀式迎入莫斯科城內，隨即俄國政府派官員斯杰潘諾夫(Stepanov)與托時見面，斯杰潘諾夫詢問托時為何而來，是否攜有國書或雍正皇帝的口諭，托時回答稱他是奉派前來祝賀女皇登基，並贈送女皇禮品，他未奉命攜帶國書前來，但有理藩院給該國樞密院的信函。

¹² 〈俄首席辦事大臣為通報彼得去世及女皇即位事〉，《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頁 538。

¹³ 〈理藩院為遵諭派使往賀俄女皇一事致俄國樞密院咨文〉，《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頁 541

¹⁴ 清朝政府派班第前往土爾扈特部一事，由於受到俄國的阻撓，該團到了邊界無法進入俄境，旋即折返，任務未能達成。

斯杰潘諾夫又問若女皇接見中國使團，托時將向女皇說些什麼話，托時答稱，他是奉理藩院之命前來與樞密院官員會面，未曾要求得到女皇的召見，雍正皇帝也未有諭示，令他要請求俄國政府安排覲見女皇，但若女皇願召見使團成員，屆時他將向女皇恭賀順利繼承皇位。¹⁵

同年一月二十六日，俄國女皇召見托時等人，此段召見過程記錄，清朝檔案並未有任何記載，而卡緬斯基所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則詳細記錄托時覲見俄國女皇過程，托時等人乘坐九輛轎式馬車，馬車前面是由士兵抬著雍正皇帝送給俄國女皇的禮品，這些禮品裝在十八個中國製的漆木箱內。當托時進入宮內後，士兵擊鼓奏樂，表示敬意；托時手捧國書(應該是理藩院的公函)走到女皇面前跪下，由俄國政府首席大臣葛羅普京(Golovkin)接下托時手中的國書，托時致辭說他是奉雍正皇帝之命前來祝賀女皇登基，並向女皇呈獻禮物…等語。《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記載托時的賀辭如下：

最英明最有威力的偉大的君主、女皇、全俄羅斯的女獨裁統治者，博德格汗陛下(指雍正皇帝)遣我等，他自己的使臣，前來恭賀女皇陛下繼承俄國皇位，轉達博德格汗陛下對女皇陛下的永恆友誼並向女皇陛下呈獻國產之禮物一宗，博德格汗陛下還諭令我等向女皇陛下問安，博德格汗陛下願祝女皇陛下順遂。如同太陽永放光芒。¹⁶

俄國首席大臣葛羅普京則代表女皇向托時說，女皇對雍正皇帝遣使前來祝賀一事，視為是兩國友好的標誌，女皇請雍正皇帝相信，俄國政府將維持這種友誼與和睦關係。隨後托時等

¹⁵ 《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頁 203。

¹⁶ 《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頁 204。

人跪下，向女皇行三叩首禮(即一跪三叩首)，再由斯杰潘諾夫唸完托時致辭的譯文：「我等使臣…謹向女皇陛下伏地恭賀…蒙恩見到女皇陛下，親睹懿容，實為萬幸」。¹⁷葛羅普京向托時等人表示，「女皇陛下仁慈接受你們的祝福，並諭令要賜給你等女皇陛下本人的恩典」。首席大臣並宣布女皇要設宴款待托時等人。於是托時等人又在向女皇呈遞國書的地點，行三叩首禮後，結束此次覲見儀式。

托時等人在莫斯科停留約兩個月時間，於三月初離開莫斯科，在離開之前，俄國女皇召見中國使團，托時等人亦按照儀制，向女皇行三叩首禮，並向俄國女皇表示感謝。女皇則透過首席大臣向托時等人說，清托時回到中國後，以女皇的名義向雍正皇帝問候，並請雍正皇帝確信俄國必將保持雙方的友誼並遵守兩國所訂條約。¹⁸托時使團在返回途中與前往土爾扈特部的滿泰等人會合，於隔年(雍正十年)春回到北京。

德新等人所率使團進入俄國後，俄國並未安排使團前往莫斯科，而是派官員陪同使團於雍正十年 (1732 年 4 月)抵達聖彼得堡，德新使團所受到禮遇與托時使團在莫斯科時相同，俄國亦以極為隆重的儀式迎接使團進入聖彼得堡。

是月二十八日，俄國政府舉行女皇加冕典禮，德新等人也受邀參加，並進入宮廷覲見俄國女皇，如同托時覲見女皇儀式一樣，德新也是手捧理藩院致該國樞密院的公函，在女皇面前跪著，再由俄國副首席大臣奧斯特曼(Osterman)從德新手中接下公函，德新並致辭表示他奉雍正皇帝之命向俄國保證，大清國將盡力維護兩國和睦的友誼，所以派他前來，並攜帶雍正皇

¹⁷ 《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頁 204。

¹⁸ 《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頁 210。

帝所贈予的禮物來向女皇祝賀。德新並說使團成員均很高興在女皇加冕之日，能親睹女皇的懿容。德新等人也是向女皇行「一跪三叩首禮」。覲見儀式結束後，德新參加俄國政府所設宴席。德新呈遞給俄國女皇的公函有兩封，第一封提到，由於雍正皇帝很重視同俄國毗鄰及多年的和平友好關係，所以特別諭令派遣使臣內閣學士德新及侍讀學士巴延泰攜帶禮物向俄國女皇祝賀。第二封則是提到有關蒙古逃人處理問題。¹⁹德新使團離開聖彼得堡後亦前往莫斯科，德新於同年 8 月率團離開，俄國女皇在德新使團離開前又召見他們，覲見儀式與首次相同，德新說使團在俄國所到的眷顧及有幸親睹女皇懿容，他代表使團向俄國政府感謝，回去後必向雍正皇帝稟報他們在俄國所受的優待情形，並希望兩國友誼能更加穩固。德新使團於雍正十一年(1733 年)一月返回中國境內。

陸、托時、德新覲見女皇禮儀問題

托時、德新奉命率領使團前往俄國，是清朝政府在對俄外交關係上的一件大事，透過兩次的出使行動，也使得清朝政府對俄國的政治、經濟、風俗民情等有了初步的瞭解。另外托時、德新與俄國官員會談情形，回國後向朝廷奏報，對雍正皇帝及朝廷大臣在處理對俄外交關係作法上，有一定的影響。

另外，托時與德新兩個使團在覲見俄國女皇，所採行的禮儀方式，是清朝政府對俄外交關係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托時與德新向俄國女皇行「一跪三叩首禮」，是否違背大清「封貢

¹⁹ 《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頁 230-231。

體制」儀禮的規定，值得探討。

依照上述兩人覲見俄國女皇情形，是行「叩首之禮」，且跪著「致頌辭」。依照大清體制，朝廷官員覲見皇帝行「三跪九叩首禮」，而據故宮博物院所藏〈大清國史禮志〉的記載，朝廷官員相見所行之禮，依其等級區分有「一跪三叩首禮」、「二跪六叩首禮」等行禮方式，如禮志內所錄「內外王公相見儀」部份，即規定外親王見內貝勒、見內郡王時，對行「一跪三叩首禮」，隨從官員亦行一跪三叩頭禮。²⁰所以托時、德新兩使團拜見俄國女皇所行的「一跪三叩首禮」，即非覲見皇帝之禮。

《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錄有雍正皇帝在德新率使團出發前給予訓令，訓令中對使團拜見俄國女皇的禮儀，特別提到：

拜見俄羅斯察罕汗一事至關重大，設若彼國之人提及將如何拜見之處，使臣等則可告之，今帶有遞交薩納特衙門文書及賚贈察罕汗禮物等語。俄羅斯國若派較大官員前來索取，即可給之。若詢問口頭轉告之言，亦可告知。俄羅斯等若不提及拜見其汗之事，則我使臣亦無須提及拜見察罕汗一事。一俟事畢，則行索覆返回。設俄羅斯察罕汗差人來告知欲會見我使臣，則可告知，我大聖主因事特派本使臣等前來，望貴察罕汗派較大官員，與我等議事了結。…貴汗欲以會見，本使臣並非不願拜見，惟我中國使臣無論出使於何國，從無叩拜之例。故此於拜見貴汗之儀有所為難。設察罕汗差人來稱務必會見，該使臣則可告以：按本國之禮，除叩拜我皇上之外，其次可拜見王爺等，我兩國自相和好已有多年，實不與他

²⁰ 《大清國史禮志》，文獻編號：206000219，頁 6-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相比，貴汗既然務必會見，則本使臣等可按拜見我王爺等之禮拜見貴汗。²¹

由訓令內容可知：第一，德新使團不要向俄方主動提起欲拜見女皇，若俄方官員亦未提起拜見該國女皇之事，則德新等人亦無須提及，僅須告知俄方他此次前來，攜有遞交該國樞密院公函及送給該國女皇禮物即可。第二，若俄方官員前來告知該國女皇欲接見使團，則德新可告訴對方，中國使臣無論出使何國，從無叩拜他國君主先例，所以此次拜見女皇之儀式有為難之處。第三，若確定要拜見該國女皇，則他僅能按照大清儀禮體制規定，向俄國女皇行「拜見王爺之禮」，即一跪三叩首禮。

托時與德新使團是清朝政府首次派往歐洲國家的官方正式使團，而使臣在覲見外國君主的儀禮體制，似無任何前例可循。雍正皇帝為避免覲見禮儀方式違背天朝體制及損害大清帝國尊榮，也不願意因外交儀禮體制問題而與俄國發生爭議，影響使團任務的達成，所以雍正皇帝才訓令使團不得主動提及敗見俄國女皇之事。學者王希隆對於雍正皇帝在訓令中命令使團若拜見俄國女皇時，應行「拜見王爺之禮」，不得行「三跪九叩首禮」。此訓令是反應雍正皇帝不願瞭解歐洲國家的交往禮儀，又不願讓使臣按與覲見本國皇帝的同等禮儀覲見的保守思想。²²

筆者認為，從順治、康熙至雍正時期，俄國多次遣使前來中國，發生多次因兩國對覲見禮儀的觀念不同，俄國使臣不願遵照大清儀禮體制行事，而遭清朝政府訓飭遣回的事件。²³清

²¹ 〈朝廷給德新及班第等人訓令〉，《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頁 550

²² 王希隆著，《中俄關係史略—1917 年前》，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1995 年，頁 103-104。

²³ 有關清代中俄兩國外交禮儀爭議問題，可參閱拙作博士論文《清代對俄

朝政府也從未將俄國看成是與大清國列為同地位的國家，甚至是將俄國視為與蒙古、琉球、朝鮮等為中國藩屬一般。凡俄國派遣使臣前來，均認為是為朝貢而來，所以應依「封貢體制」規定行事。所以當時在雍正皇帝的心中，他絕不會認為俄國女皇的地位是跟他一樣的，最多也只能跟王爺一樣，所以他要使團在「拜見」(而不是覲見)俄國女皇時，只能行一跪三叩首禮，而這也是雍正皇帝給使團在向俄國女皇行禮時的底線。

柒、清朝政府允讓「領地」給予俄國問題

托時、德新率使團前往俄國，並非單純為祝賀俄國女皇即位，當然負有其它重要的任務，例如朝廷給予德新、班第的訓令，即命德新要向俄國政府說明朝廷對於準噶爾部動亂一事，將派兵征討，希望先取得俄國的諒解，並要求俄國採取中立的態度，不要協助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策零(Galdan Tesern)。訓令中並提到「彼準噶爾所居之地，雖與內地相距遙遠，今我朝廷將使其地為耕地，變其屬下人眾為朝廷直接統治之民」²⁴，亦即清朝政府準備以軍事武力平定準噶爾部，將該部納入大清國實力統治之下，該部所據土地及人民，均歸於大清國所有。

但清朝政府對於俄國的動向仍有所顧忌，所以在訓令中，清朝政府命德新向俄國表示，若清軍征討準噶部，若該部有流散之人逃至俄國，該國可收留之，但該部階級較高者如台吉、

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1644-1861)》，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2006年5月。

²⁴ 〈朝廷給德新及班第等人訓令〉，《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頁552

宰桑等，清朝政府則要求俄國遣返。

而托時與俄國官員商議情形，依據卡緬斯基《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的記載，托時以準噶爾部的問題，向俄國建議「當中國軍隊進攻準噶爾，並佔領他們的土地時，如果女皇陛下對與其鄰近的土地有什麼需求，就請告知中國使臣，這些土地可讓給俄國」。²⁵清朝政府爲了儘速解決準噶部動亂問題，及爲要求俄國支持清朝政府對該部的征討行動，準備在平定該部後，屆時可將該部逃入俄國的人民(清朝政府的「屬民」)以及準噶爾部的部份土地讓予俄國。

托時向俄國官員提出上述的建議，除了上述俄國檔案史料有所記錄外，在清朝的中文檔案史料找不到相關的記載，所以俄國檔案史料的記錄是否爲真，在缺乏足夠相關的史料佐證下很難印證。惟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於民國二十五年八月所出版的《故宮俄文史料—清康乾間俄國來文原檔》收錄清宮所發現的俄國原文史料，該書的第二十三號文件，乃俄國樞密院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五月行文理藩院的咨文，該咨文發出的原因是當時清朝政府曾向俄國政府表示，準噶爾部台吉阿睦爾撒納(Amursana)因叛亂遭清朝軍隊追擊，可能由哈薩克逃入俄國境內，清朝政府希望俄國屆時若阿睦爾撒納進入該國境內，能將其交給清朝政府處理一事。此咨文即是俄國樞密院所提出的答覆。咨文中有一段內容提到托時與俄國官員商議的情形：

查與兩國為鄰之準噶爾民族，迄今未屬於某國，係處於其固有君王統治之下，乃為人所共知，故前於 1731 年(雍正 9 年)貴國派往俄廷大使侍郎托時及其隨從人等，因當

²⁵ 《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頁 208

時中國與準噶爾民族之戰爭，曾遵貴國大皇帝陛下諭旨，向俄方提議云，俟中國軍隊向準噶爾民族進攻之時，該民族中凡逃往俄國之各部落，即請容納。惟請將其中之王公貴族交付中國，至容留於俄國之人等，必須於可靠處所嚴加管束，務使不能於國界一帶為任何騷擾及犯罪事。此外，該大使此外曾向俄方申明，中國軍隊占領準噶爾土地之時，由該項土地之中，可以將所須要之若干部份讓與俄國。²⁶

本件俄文原始檔案的記錄，雖為乾隆時期俄國政府與清朝政府交涉準噶爾部問題的文件，但俄國政府卻能將雍正時期托時奉派赴俄國時，所提以俄國能容納該部逃人及讓與土地予俄國的建議及談判的協議，作為與清朝政府談判的依據。學者李齊芳對此事撰文稱此一文件雖是屬 18 世紀中葉準噶爾部覆亡時，所發生的清朝政府與俄國一段交涉過程，可是俄國政府所根據準則多是托時對俄國所提的建議，可見他們(指俄國政府)把這些文件都存放在時常應用的範圍。²⁷

捌、清朝所修官書不載托時、德新使俄問題

托時、德新奉派率使團前往俄國祝賀女皇登基，對清朝政府而言，是首次派正式使臣前往俄國，這是一件大事。但在清朝所修官書上，卻未見任何有關對此事的記錄，因為清朝政府

²⁶ 本件檔案除收錄在北平故宮博物院版的《故宮俄文史料》，編號 23 號文件，頁 304-312 之外，北京「歷史研究」編輯部於 1964 年 12 月出版的《故宮俄文史料》亦收錄此文件，編號為第 42 號，頁 53-56

²⁷ 李齊芳著，《中俄關係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頁 128-130

名義上是藉為女皇慶賀，實際上是為征伐準噶爾部一事與俄國商議。如此重要的情事，朝廷相關大臣事前應經過詳細的討論與規劃，並將計劃內容、出使俄國人選等事向雍正皇帝奏報，獲得雍正皇帝諭示後，才能派出使臣赴俄國執行任務。使臣返回後，也應將出使經過及與俄國政府商議達成何種協議，任務是否達成等事，均須向雍正皇帝報告。

部份研究中俄關係的學者，曾對此問題撰文討論，如李齊芳在其書上第四章〈清雍正皇帝兩次遣使赴俄之謎〉²⁸，以及王希隆所撰〈托時、德新奉使俄國及其有關問題〉一文²⁹，學者 Mark Mancall 所撰 "China first Missions to Russia, 1727-1731, in paper on China" 一文³⁰，均引據相關事證資料佐證。Mark Mancall 認為此段史實記錄是被雍正皇帝銷毀的。³¹王希隆認為，「這與乾隆平定準噶爾時，俄國違背承諾，收留阿睦爾撒納等逃人，以及乾隆帝對其父遣使俄國的作法不以為然有關」。李齊芳則說乾隆皇帝認為若讓「那些請俄助清以滅準噶爾的外交文件，載入官史中，不但對乾隆皇帝輝皇的十全武功有礙，而且托時、德新兩位大使對俄國女皇行三跪九叩禮的記錄實有損清帝國的國威。所以兩位學者均推測應是後來乾隆皇帝在位時，下令將雍正皇帝時期此段遣使赴俄相關紀錄隱諱不

²⁸ 同前註，頁 111-139，李氏此書並未參考引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編《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中所收錄該館所藏滿文俄羅斯檔有關托時、德新使俄相關檔案計有十七件，所以該章部份論述與其它學者所述有所不同。

²⁹ 王希隆撰，〈托時、德新奉使俄國及其有關問題〉，蘭州大學學報，1995 年第 4 期，頁 140-146；王氏在此文發表後不久，隨即出版《中俄關係史略》一書，在該書中王氏將其原先發表在蘭州大學學報上討論清朝所修官書為何不載此段史事之原因簡略，放在該書第 110 頁的註解中。

³⁰ Mark Mancall, "China first Missions to Russia, 1727-1731, in paper on China," 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55, Vol. 9.

³¹ Mancall, op. cit. vol 9, p.102.

載，或將檔案記錄銷毀的。

筆者贊同李、王兩位學者的看法，因為這件事與俄國政府在乾隆皇帝派軍平定準噶爾部後，並未遵守兩國所訂條約及相關協議，仍然容留逃人，導致兩國關係惡化有關。由於準噶爾部動亂問題，影響大清國西北疆域的安寧，甚至危及蒙古喀爾喀諸部。所以先有康熙皇帝曾率軍親征準噶爾部，後有雍正征討準噶爾部，雖然直到雍正去世仍無法克盡全功。

乾隆皇帝即位，因準噶爾部領導階層發生內鬨，清朝政府乘此良機，於乾隆二十年(1755 年)派軍前往征討，準噶爾部的阿睦爾撒納(Amur-sana)向清朝政府投誠，配合清朝軍隊的行動，終於平定準噶爾部。不久，阿睦爾撒納又率軍叛離清朝政府，乾隆皇帝旋即派兵征討，阿睦爾撒納為躲避清軍追擊，率部眾進入哈薩克，隨後逃入俄國境內。《故宮俄文史料》第四十號檔案，是理藩院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發給俄國樞密院的咨文，咨文內容提到阿睦爾撒納率領部眾上萬人歸順於大清國。乾隆皇帝「天性仁慈，不分畛域，一視同仁」，賜予該部眾游牧地方，並供給房屋衣食，使該部生計得以維持，對阿睦爾撒納等領導人加以冊封賞賜。其後阿睦爾撒納又叛離清朝政府，遭清軍追擊而逃至哈薩克，竄入俄國境內，此乃理藩院所以要求俄國樞密院於阿睦爾撒納逃入俄國時，務必將其交付清朝政府的道理所在。³²

第四十一號檔案是理藩院於同年六月再行文俄國樞密院，咨文內容提到有烏梁海人逃入俄國，駐邊俄國官員拒絕交付該等逃人，所以理藩院在咨文內容強調，烏梁海人向來對大清國

³² 《故宮俄文史料》，第 40 號文件，北京「歷史研究」編輯部編，1964 年，頁 51

臣服，並受封賞，清朝政府對部份烏梁海領導人授予官職，賞戴頂翎，久已為大清國之臣屬。兩國以前所訂友好條約，有不得隱匿逃犯之規定，所以俄國官員容留烏梁海逃人是違反條約的。因此理藩院要求該國儘速交付該等逃人。³³

如前述，俄國政府對理藩院發出的兩件咨文所作的答覆，收錄在《故宮俄文史料—清康乾間俄國來文原檔》第二十三號文件，俄國政府在答覆理藩院行文時表示，俄國認為準噶爾從不屬於中國，雖然清朝政府對準噶部用兵，但俄國政府認為「貴國大皇帝因準噶爾民族之內亂，加以征討，但此此種事情並不能禁止準噶爾人民，自願歸化俄羅斯大女皇帝陛下，以及俄國容納其入籍也」。所以俄國認為對於已歸化成為俄國屬民的準噶爾人等，俄國政府沒有與清朝政府協商的必要。

對於清朝政府準備派兵進入哈薩克境內追擊阿睦爾撒納等人，俄國政府在咨文中稱「吉爾吉斯哈薩克民族之多數人等，均屬我俄羅斯女皇陛下之國籍，故貴國如對該民族中之俄屬人民實行戰爭，實與兩國現存之友誼關係不合」。

俄國政府稱該國不知阿睦爾撒納逃至何處，而且準噶爾及烏梁海逃人，現時均非大清之「屬民」，所以該等人不能依據條約交付給清朝政府。俄國政府稱「彼如於某時逃來俄境，此事只能依據兩國現存之友誼關係商辦。但敝國由準噶爾民族得到之消息，謂貴國招引準噶爾人入國籍時，似曾頒布上諭，使該民族相信，貴國大皇帝能強迫俄羅斯交還其由準噶爾所奪去之土地。惟查本國未曾由準噶爾民族奪去任何土地。從前，一七三一年之中國大使侍郎托時關於貴國武力征服準噶爾時，將由

³³ 同前註，第 41 號文件，頁 52

準噶爾土地之中，讓與俄國一節，曾用貴國大皇帝之名義，爲正式之允諾」。³⁴

由咨文內容可知，俄國政府似有利用當時清朝政府於西北用兵，邊疆諸部族時思蠢動之機，隱然有以交付阿睦爾撒納爲條件，使清朝政府履行一七三一年托時承諾將準噶爾部土地讓與俄國的諾言，並趁勢將相關逃人納入俄國國籍。

對於俄國政府如此的答覆，清朝政府當然相當不滿，尤其是在乾隆皇帝平定準噶爾部之後，大清國勢正強，對於處理與俄國外交問題，即採強硬的手段，其數度下令中斷恰克圖貿易，並強烈要求俄國必須交付阿睦爾撒納，並聲稱若俄方不交付，清軍不惜動武，直到阿睦爾撒納病死，俄方將屍體獻出經清朝官員確認無誤後，此事始告平息。

正因此時，大清國在乾隆皇帝領政之下國勢甚盛，所以他對於雍正時期，托時、德新奉派赴俄，提出可讓與準噶爾的土地予以俄國的條件，換取俄國不要干涉清朝政府派兵征討準噶爾部一事的作法，不以爲然。另外，托時、德新向俄國女皇行「一跪三叩首禮」，此事若讓大清帝國所屬藩部屬國知曉，豈不有損大清帝國之尊榮，而且使其父親雍正皇帝「天子」之盛名受到誣蔑。

³⁴ 《故宮俄文史料》第 42 號，頁 53-56

玖、結論

清朝政府對於西北、西南的外藩由理藩院掌管，理藩院原名為「蒙古衙門」，清太宗崇德3年(1638年)改稱為理藩院。主要負責處理蒙古、西藏與新疆回部等邊疆地區事務，位於西、北兩方陸路上，如安集延、浩罕、巴達克山等國與清朝關係，也由理藩院管轄。另外由於俄國緊鄰蒙古，且該國與蒙古早有貿易往來，所以理藩院也被指定處理中俄雙方的外交事務，包括協調兩國的外交關係，負責兩國貿易相關事務及管理在北京的俄國人員。

理藩院最主要的工作是負責管轄蒙古等藩部事務，蒙古各藩部既為大清帝國所屬，清朝政府與蒙古藩部之間，是一種「上」對「下」的階層關係，也是「君」對「臣」的關係。所以蒙古各藩部須遵大清禮儀，並向大清朝貢、接受大清皇帝冊封、奉大清正朔…等。而俄國既然與蒙古諸藩部居於同地位，所以清朝政府理所當然的認為，大清帝國尊為「上國」，視俄國為「下國」，俄國既為「下國」，其要與「上國」交往，當然必須遵照大清帝國「封貢體制」的儀禮定制行事，在覲見禮儀、呈獻國書程序、國書的稱號及禮物的呈送儀式等問題，均須要嚴格遵守相關規定。當然俄國對於中國此種不同西方外交傳統禮儀的特殊體制感到不解與無法認同，從順治時期俄國遣使來華開始，在外交儀禮體制上的爭議是清代各朝對俄國外交上的重要問題。

雖然在雙方交往的過程當中，清朝政府曾因西北邊疆問題面臨困境，於是與俄國尋求妥善的解決辦法。如清朝政府在恰克圖條約簽訂前一段時間，因為準噶爾叛亂問題，雍正為對俄國展現誠意，在外交禮儀上作了稍許的讓步，甚至破天荒的派

出使節團前往俄國慶賀俄皇登基。但這也是因局勢所迫而作出暫時的妥協手段而已。

雍正皇帝對於派出外國之使臣，在外交禮儀方面均要求遵循「封貢體制」儀禮規定行事，當然不允許本國使臣以覲見皇帝的「三跪九叩首」行禮方式去拜見俄國女皇，若允此方式，就等於承認俄國女皇與大清國皇帝是處於同等的地位。這對清朝政府而言，不僅有損雍正皇帝「天子」之尊嚴，這對大清恪遵「封貢體制」儀禮定制之原則，也是一大傷害。若讓所屬藩部及屬國知曉此事，豈不讓身為「宗主國」的大清國顏面盡失。

清朝政府為避免發生上述情形，托時、德新兩使團均未攜帶雍正皇帝給予俄國的「敕諭」，朝廷只給兩使團各一封由理藩院發給俄國樞密院的咨文。以避免覲見俄國女皇時，發生覲見禮儀之爭議。清朝政府也清楚托時及德新兩人所率使團均是以祝賀俄國女皇登基的名義，奉朝廷指派前往俄國，俄國女皇召見使團的機率是非常高的。朝廷的訓令指示若俄國女皇召見使臣，托時、德新應向俄國官員告知覲見禮儀為難之處，若無法回絕，則應告訴俄國官員說，使臣將以拜見本國王爺之禮(一跪三叩首)方式，來向俄國女皇行禮。

從托時、德新覲見俄國女皇的整個過程當中，俄國政府似乎對兩位使臣的覲見禮儀方式感到滿意，未有任何爭議。清朝檔案史料中並未發現朝廷給予托時的訓令，但從上述朝廷給予德新的訓令內容，及從俄國史料記載托時覲見俄國女皇時，行「一跪三叩首」之禮，可推測托時在出發前，朝廷應有類似給予德新的訓令或指示要托時遵照行事。

筆者認為，俄國政府若知道托時、德新兩個使團，是要採

用「拜見王爺之禮」來向該國女皇行禮的話，應該是不會答應的。這等於是將俄國女皇的地位「降級」及「貶抑」，而與中國的「王爺」居於此同等級，也是說大清國的皇帝還是高於俄國女皇，如此有損俄國女皇及俄羅斯帝國之尊容，俄國必定會認為這樣的行禮方式，對俄國政府而言，是很無禮的。所以很有可能托時及德新在與俄國官員商議覲見方式時，未將「一跪三叩首禮」僅是本國官員拜見王爺所行之禮而非覲見皇帝的行禮方式，詳細的向俄國官員說明。

而俄國官員也可能「誤認」托時、德新等人向該國女皇下跪磕頭，如同向中國皇帝行禮一般，所以也同意這樣的行禮方式，並熱誠的招待清朝政府派去的使團。俄國方面可能不太明瞭清朝政府執意遵循「封貢體制」的儀禮規定，而清朝政府也依此體制來確保雍正皇帝身為大清帝國及周邊屬藩、屬國皇帝的至高尊榮，及大清國為周邊屬藩、屬國之「宗主國」崇高地位。而這種對外關係所持的原則與態度，也是大清國自開國以來的每位君主所沿襲遵守的。

明清之際，亦是俄羅斯積極將其勢力向東方拓展之時，新疆地區也是俄國覬覦的目標，當時新疆北路為準噶爾部所據，康熙年間，俄國與準噶爾部噶爾丹建立良好關係，在俄國協助之下，噶爾丹屢犯喀爾喀，並潛兵入藏，康熙御駕親征，噶爾丹雖兵敗病逝，但準噶爾勢力依舊強大，雍正皇帝備戰多年，清軍進剿仍未竟全功，所以準噶爾部動亂一事，不僅是雍正皇帝的心頭大患，也是當時大清國欲建立版圖遼闊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最大阻礙。為解決此問題，雍正皇帝才會破天荒的派出使團前往俄國，它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向俄國女皇慶賀登基，而是要與俄國商議請俄國不要干涉清朝政府處理準噶爾動亂一事，清朝政府則以商業貿易利益及未來征剿準噶爾所得土地給

予俄國，作為交換的條件。乾隆皇帝繼位後，對於準噶爾問題他指出，「準噶爾一部，久外生成，聖祖、世宗兩朝，屢興撻伐，未既厥緒，其經畫邊陲之事，就是繼述祖宗未竟之志」。³⁵最終準噶爾的動亂在乾隆皇帝的運籌帷幄之下獲得平定，開拓其「十全武功」之基業。於其上諭中常提到「從前我皇祖皇考屢申撻伐」未能成功，而他能「克集大勳」，「收自古以來未收之地，臣自古以來未臣之民」等誇其勳業之言論。

所以在此種情況下，若仍舊讓那些以讓與土地為條件換取俄國協助，始能征勦準噶爾部的外交文獻載入官修史書上，豈不辱及大清「天朝上國」之體面。另外依照中國傳統綱常禮數，臣、子不得暴露君、父之過，所以乾隆時撰修雍正實錄、起居注等官書時，未將托時、德新奉使俄國一事載入，使其湮沒也。在筆者心中也形成有一個問題，若是乾隆皇帝命令將此段史實刪去，為何只將漢文的資料刪去，而滿文及俄文的檔案確未刪去，所以我們能在滿文俄羅斯檔及俄國來文原檔當中，發現這些史料，是當時負責刪去相關檔案官員的疏忽，或是其它原因，值得研究。

³⁵ 莊吉發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82年，頁2。

參考文獻

一、 傳統文獻

1. (清)金兆豐編或寫，《大清國修正賓禮志》，文獻編號 6000134，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 (清)萬斯同編，《明史稿》，〈鄭和傳〉，原稿藏於南京圖書館古籍部。
3. 《禮志 — 賓禮一》，文獻編號 6000218，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 王之相譯，《故宮俄文史料 — 清康、雍、乾、嘉、道年間俄中兩國來往文件檔案》，北京：「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印，1964 年。
5. 王之相、劉澤榮譯，《故宮俄文史料(清康乾間俄國來文原檔)》，北京：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6 年。
6. 北京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 第一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二、 近代論著

1. 〔俄〕Bantish-Kamensky 班蒂什-卡緬斯基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
2. 王希隆，《中俄關係史略(1917 年以前)》，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年。
3. 何漢文，《中俄外交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 年。

4. 李齊芳，《中俄關係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
5.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82 年。
6. 陳維新，《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 (1644-1861)》，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
7. 陳復光，《有清一代中俄關係》，民國叢書第二編，國立雲南大學文法學院出版，1947 年。
8. 張啓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5 年。
9. Mark Mancall, "China first Missions to Russia, 1727-1731, in paper on China," 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55.

A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tocol of Yongzheng Emperor detached envoy to Russia

Wei-Hsin Chen *

Abstract

In 1729, Qing government wrote the letter to Russia, wanting to sent the envoy and administrator to congratulate the Peter II on his ascension, and pass the Russia to the inhabited area of Turugut tribe. On May,1729, Qing government wrote the letter again and expressed that Tuo-shr will be going to Russia.

Why the Yongzheng Emperor sent the envoy to Russia? It only for congratulate the Peter II on his ascension or has the goal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s worth of explore. The history books blind any record about China first time sent the diplomatic corps to Russia, some scholars has been researched but the view are not one. This thesis will attempt to use the archives to researched the cause that why the Yongzheng Emperor sent the envoy to Russia, and plans to use the concept of “Tributary system” to explain that Tuo-shr negotiated with Russian government personnel for diplomatic protocol of audience with the Peter II. The author also plans to explain that why this section of records didn’t got the metion by Qing government.

Keyword : Tributary system, Turugut

* Department of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